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PG 上海高校智库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11



财政政治学译丛

刘守刚 魏 陆 主编



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信任利维坦

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马丁·唐顿（Martin Daunton） 著
魏 陆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11



财政政治学译丛

刘守刚 魏 陆 主编



上海高校智库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

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信任利维坦

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马丁·唐顿（Martin Daunton） 著

魏 陆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英)马丁·唐顿
(Martin Daunton)著;魏陆译.一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12

(财政政治学译丛)

书名原文: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ISBN 978-7-5642-3249-8/F·3249

I.①信… II.①马…②魏… III.①税收制度-财政史-研究-英国-19世纪
IV.①F815.6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3843号

图字:09-2015-556号

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ISBN 9780521037488) by
Martin Daunto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201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2019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责任编辑 刘 兵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信任利维坦

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马丁·唐顿 著

魏 陆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 邮编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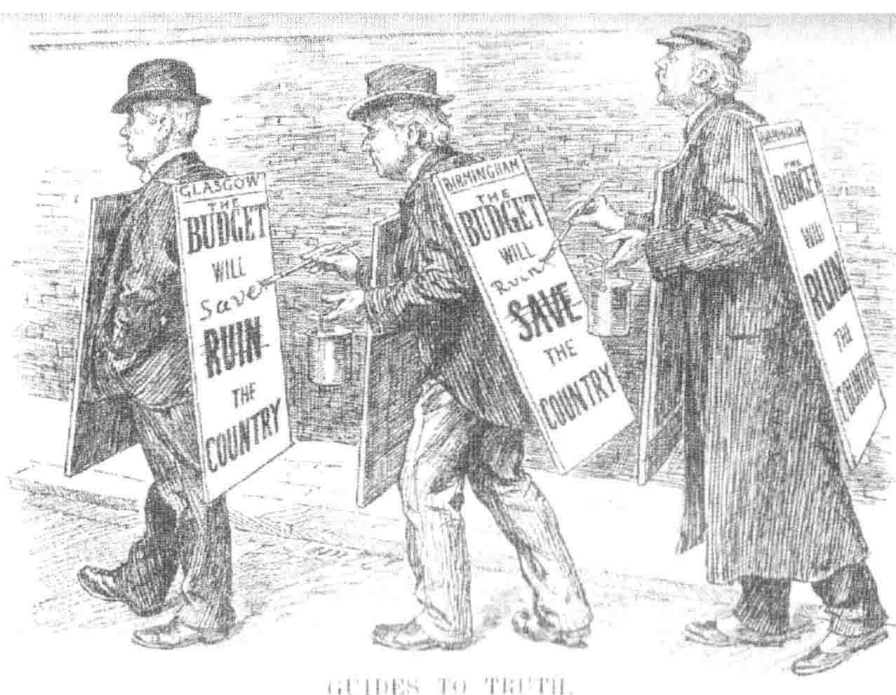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28.75印张(插页:2) 440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89.00元



卷首插图：“指引真相”——1909年9月22日的《潘趣》(Punch)

图中的文字：预算将挽救/摧毁国家，这幅漫画指的是1909年的“人民预算”。走在最后面的保守党领导人亚瑟·巴尔福(Arthur Balfour)正在修改自由党财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后背上的宣传牌，走在最前面的前自由党财政大臣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宣称自己反对这一预算案。

信任利维坦

马丁·唐顿(Martin Daunton)这本关于英国 19 世纪税收政治学的巨著研究了国家与其国民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在 1800 年左右,税收占英国国民收入的 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 10%。这一财政收缩(fiscal containment)过程使得人们非常信任英国政府财政的清廉性和税收的公平性,奠定了 19 世纪下半叶政府行为的政治正确性,使其在 20 世纪能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战争和福利支出。这本书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已有的大量文献结合在了一起,脉络清晰,涉及面广,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

马丁·唐顿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研究员和历史系经济史教授,是《进步与贫困:英国经济与社会史(1700—1850)》(*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1995)一书的作者,《英国剑桥城市史》(第三卷)的编者。

总 序

成立于2013年9月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是由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的十大高校智库之一。通过建立多学科融合、协同研究、机制创新的科研平台,围绕财政、税收、医疗、教育、土地、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领域,组织专家开展政策咨询和决策研究,致力于以问题为导向,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需求,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与治理咨询报告,向社会传播公共政策与治理知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咨政启民”的“思想库”作用。

作为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的智库,在开展政策咨询和决策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关注公共政策与治理领域基础理论的深化与学科的拓展研究。特别地,我们支持从政治视角研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制度,鼓励对财政制度构建和现实运行背后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及历史智慧进行深度探索。这样一种研究,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早在其经典教材《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就命名为“财政政治学”。但在当前的中国财政学界,遵循马斯格雷夫指出的这一路径,突破经济学视野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财政问题,还比较少见。由此既局限了财政学科自身的发展,又不能满足社会对运用财税工具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财政学界呼吁拓展研究的范围,努力构建财政政治学学科。

“财政政治学”虽然尚不是我国学术界的正式名称,但在国外的教学和研究中却有丰富的内容。要在中国构建财政政治学学科,在坚持以“我”为主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应该大量翻译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内容,以便为国内财政学者从政治维度研究财政问题提供借鉴。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丛书,正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资助下形成的“财政政治学译丛”。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财政政治学译丛”中的文本，主要从美英学者著作中精心选择而来，大致分为理论基础、现实制度与历史经验等几方面。译丛第一辑推出 10 本译著，未来根据需求和可能，将陆续选择其他相关文本翻译出版。

推进财政政治学译丛出版是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的一项重点工程，我们将以努力促进政策研究和深化理论基础为己任，提升和推进政策和理论研究水平，引领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治理。

胡怡建

2015 年 5 月 15 日

译者序

这本书是马丁·唐顿教授关于 18 世纪末以来英国税收政治学两卷本著作的第一本。^① 马丁·唐顿 1970 年毕业于诺丁汉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4 年到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 年到剑桥大学任教,之前他先后任教于杜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在剑桥大学,他主要教授 1700 年以后的英国经济和社会史、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等课程,还担任历史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务。2004 年,他当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并且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 2014 年退休。马丁·唐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 19 和 20 世纪英国及其帝国和美国的经济社会政策,他出版了多本有关这一时期英国税收、住房、邮政以及经济和社会历史方面的著作,目前仍在致力于代际公平和经济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世界廉价政府等项目的研究。

本书全面描述了“漫长的 19 世纪”英国税收制度变化的政治因缘,阐释人民为何变得信任国家(利维坦)了。在《圣经·旧约》中,利维坦(Leviathan)是一头强大到足以与恶魔撒旦相提并论的巨大水生怪物。《约伯记》第 41 章提到,利维坦是一头巨大的水生物,当它畅泳于大海之时,波涛亦为之逆流;它口中喷着火焰,鼻子冒出烟雾,拥有锐利的牙齿,身体好像包裹着铠甲般坚固;它性格冷酷无情,暴戾好杀,在海洋之中寻找猎物,令四周生物闻之色变。在基督教中,利维坦成为恶魔的代名词,代表着七宗罪之一的“嫉妒”之恶。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中,有很多以利维坦命名或者作为主人公的书籍、电影、游戏等作品。1651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

^① 另一本是《公平税赋:英国的税收政治学 1914—1979 年》(*Just Taxes: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914—1979*),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Thomas Hobbes)出版了其政治学巨著《利维坦》^①，他以利维坦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认为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在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会订立契约，国家由此产生。在这部著作中，霍布斯用“利维坦”喻指国家：它有双面性格，由人组成，由人运作，因此具有半神半兽的人性品质，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的最高理想。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对其后洛克、卢梭等哲学家的社会契约论具有深远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该书一直位列领袖人物必读的政治书籍之首。

马丁·唐顿的这本书延续了霍布斯将国家喻为利维坦的说法，从1799年讲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用大量数据和史料向我们阐述了19世纪英国所得税、遗产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收制度的变化，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面临的困境，皮特、皮尔、格莱斯顿、迪斯雷利、哈考特、戈申、张伯伦等著名政治家的税收主张，以及早期辉格党和托利党、后期保守党、自由党、自由统一党、工党等围绕税收进行的政治斗争。这本书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已有的大量文献结合在了一起，脉络清晰，涉及面广，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马丁·唐顿的分析以及英国19世纪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英国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重新获得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没有发生法国和德国那样的暴力革命性事件，本人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总体税收负担持续降低。纵观英国历史，战争对税收制度有重要影响，为新税种的开征或者大幅改革税制提供了重要契机。1799年时，英国还在与大革命后的法国进行交战，出于筹措战争经费之需，首次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此时税收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20%，属于较高水平。随着1815年拿破仑法国的失败，英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1901年)，积极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建立了庞大的英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皆飞速发展，英国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大英帝国进入全盛时期。在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政

^① 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又译为《巨灵论》。

府奉行自由经济和节俭政策,国家税收和支出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关税、消费税的税率和征收范围都不断缩减,同时经济发展使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税收收入下降到了国民收入的10%左右,英国相对税负水平下降程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合理的税负水平是人们心甘情愿接受国家行为的前提条件,持续降低的税负减轻了人们对税收的抗拒心理,使得人们认为政府是节俭的,增加了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感。

二是税收制度均衡了各方的利益。即使税收负担很低,但是如果很不公平,也会激起人们的反抗(如19世纪的德国和法国)。英国税收制度较好地均衡了各方的利益和诉求,如早期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比例税制,反对对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行差别征税和实行累进税制,这使得很多自由党国会议员认为对来自知识和专业服务的劳动性收入征税太重,对来自财产和投资的非劳动收入征税太轻,从而有利于食利阶层,不利于劳动阶层,既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遗产税被作为确保税收制度均衡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对动产和不动产征收不同的遗产税,补偿了劳动收入承受的过高所得税负担,消除了人们对所得税的批评,为所得税营造了公平氛围,平息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所得税引起的紧张氛围,使人们总体认为税收制度是公平的。在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后,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附加税,对劳动收入实行较低的累进税率,同时对中低收入者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均衡了各方的利益和诉求,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税收。

三是税收经过了国会的充分辩论。英国是现代议会制度之母,1832年、1867年和1884年,英国对国会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改革,一方面不断调整国会议席分配方式,新兴工业城市获得了更多的席位;另一方面不断降低选民的财产和身份要求,选民范围持续扩大。这些改革促进了议会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同时也推动了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的发展,如何争取选民成为政党活动的核心。同时,一个人如果没有政党的支持也很难当选议员,他进入议会后就必须服从于自己所在党的领袖,因此政党实际上控制了议会。英国很早就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1854年,国会通过了《公共收入与统一账户法》,规定此后政府每年都必须向国会报告总收入和总支出;1866年,国会设立了独立的公共账户审计委员会,不受政府首脑和各部门的领导,只向国会负责,将政府向国

会递交部门预算及审计后的账户进行了制度化。在英国议会制下，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保守派和自由派等都可以在国会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由于任何税收制度的变革都必须经过国会的辩论和批准，这就使得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在税收制度上都不能一意孤行，必须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同时，国会辩论和讨论使得税收制度的变革公开透明，社会各界非常清晰不同政党和政治人物的立场，在选举时可以通过选票支持自己的代言人，即使国会和政治人物做出的决策不符合自己的立场，也不会做出过激行为，期待在下次选举中通过选票改变政策。因此，在英国议会制度下，权力制约使得人们相信国家是值得信赖的。

四是税收征管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英国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地方性的外行控制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模式对于所得税在 19 世纪能够被人们接受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确立税收的合法性。如将土地所得税的征管责任转移给了纳税阶层，每个郡的大陪审团从潜在的纳税人中挑选外行土地税委任专员，这些土地税委任专员负责任命一般委任专员，一般委任专员要交纳土地所得税，这些一般委任专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是“在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地位的人，不偏袒某一方或者不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是正直诚实和独立性很强的人”。再由一般委任专员任命评估员。因此，政府依靠地方社区对所得税进行管理，利用同类型的人充当地方执法官，这一特征被格莱斯顿概括为“通过一个志愿的中间机构”征税，相当于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更容易建立人们对税收的一致认同和信任。因此在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虽然也爆发了工人运动，但是并没有像法国、德国那样爆发激烈的革命。

五是税收支出呼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税收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如果征收上来的税收被挥霍浪费了，再少的税收人们也是不认同的，如果税收被用来为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了，多一些税收人们也是接受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的原因，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纠正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问题增加了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了人们对文化、教育、福利等支出项目的需求；随着政党政治竞争的加剧，为获得公众拥护和赢得选票，政治家们倾向于投选民所好增加福利支出。19 世纪后

半期,为了解决集体行动失灵问题,英国政府增加了教育、公共卫生、贫民区改造、救济穷人和维护公共秩序等方面的支出。1860年,英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18%,188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0.29%。19世纪后期英国国民预期寿命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环境改善带来的结果,环境改善得益于对修建下水道、供水设施以及铺设道路进行的大量资本性投资,城市清洁和管理标准的提高,以及隔离医院和产科诊所的增加。社会公众从政府支出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增加了对国家的信任,从原来反对转为支持政府扩大社会支出。

马丁·唐顿这本关于19世纪英国税收政治的书对于现代国家也非常有启示意义。如:为了增强人们对税收的认同性,减少税收对社会造成的撕裂,提高税收遵从度,一项税收制度在实施前必须经过社会充分的讨论,尤其是要经过立法机构批准才能够实施。再如:税收制度是难以一步到位的,实现理想税制很难,适当的妥协和折中是需要的,英国个人所得税从一项战时临时税到永久性税收,从比例税制到累进税制,经过了上百年的不断改进,最后才演变为现代所得税制,税收制度看似不完美,但可能是最适合当下环境的。又如,在和平时期政府税收应尽可能保持低水平,为战争和不时之需提高税收留有空间,英国1914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1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收入水平提高至国民收入的25%,并且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不曾有所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收入进一步提高至国民收入的40%,正是由于19世纪奠定的良好基础,才使得英国在20世纪能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战争和福利支出。

本书是由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魏陆研究员牵头翻译的,由于本书涉及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很多方面的内容,翻译工作量巨大,历经5年时间才得以完成。我指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刘凤丹、戴林序、韩琳、丁相月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工作,魏陆对稿子进行多次译校。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刘兵先生为本书的辛苦付出。

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魏 陆

2018年12月27日

前 言

我要写一本关于 18 世纪末期以来英国税收政治专著的想法,最初来自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和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的建议。在这项漫长的研究与写作即将结束之际,对于他们让我投身于此项研究的建议,我仍心存感激。在扩展他们的初始想法后,我很快就发现,为了厘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撒切尔改革这一期间的变化,对浩瀚数量档案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有幸得到了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s)的慷慨资助,该基金会 1992~1993 年给予我社会科学研究奖学金;1995~1996 年,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即现在的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多给了我一学期的学术假,这使我可以走遍全国搜集到大量 1890 年至今的档案资料。因此,我放弃了最初只写一本简短单卷本的想法,该项目也随之从朗文出版社(Longmans)转交给了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无论是朗文出版社的安德鲁·麦克伦南(Andrew McLennan)和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还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霍华德(Elizabeth Howard)和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都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本书全面描述了“漫长的 19 世纪”,从 1799 年开始,此时英国还在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交战,税收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 20%,首次引入了所得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此时税收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 10%。这段时间是财政收缩时期,英国抑制和削减税负水平的程度之大、时间之长,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人民认为英国财政制度是“公平”的,均衡了各方的利益,从而奠定了政府行为的高度正确性,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期。然而自 1914 年起,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财政收入水平提高至国民收入的25%，并且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不曾有所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收入进一步提高至国民收入的40%。这一趋势的含义将会在本人的另一本书中进行详解，该书会详细研究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是如何消亡的，而本书研究的是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是如何建立的。

试图弄明白一个新的复杂主题不仅仅需要时间，为了厘清诸多迥异的想法和概念，还需要进行知识辩论与讨论。幸运之神再次垂青于我。本书的写作还受益于其他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是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和科林·马修(Colin Matthew)，在我开展研究和进行本书写作时，我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关于“漫长的19世纪”的税收和格莱斯顿预算的文章奠定了我开始这一研究的基础，本书得益于他们卓越的前期工作。1999年，科林·马修与世长辞，他的很多朋友都深感震惊和悲痛。

我试图厘清英国税收制度长期变化原因的努力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科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的大力帮助。作为“管理、施政能力、服从”研究项目的一部分，1994年该院邀请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在那里，我在1994年写作之初和1996年发表了很多评论性文章，这些评论对我厘清分析思路有着巨大的帮助。我极其感激研究院帕特里克·特洛伊(Patrick Troy)教授长期的慷慨资助与鼓励，他为我提供了宜人的跨学科交流工作环境。两位访问学者给我的评论也大有裨益，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玛格利特·李维(Margaret Levi)和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罗德尼·洛(Rodney Lowe)。

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是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进行的，我对税收的痴迷也让我的学生吃尽了苦头，直到我前往剑桥大学工作后，他们才得以清闲。本书最终是在剑桥大学完成的，在那里，我受到了许多新同事著作的启发，特别是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欧金尼奥·比亚吉尼(Eugenio Biagini)、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克雷格·马尔格鲁(Craig Muldrew)、乔恩·帕里(Jon Parry)、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西蒙·斯莱特和亚当·图兹(Adam Tooze)，他们帮助我对

政治语言中的利益集团、福利制度的发展、信托、公共卫生投资、帝国财政、经济学知识和许多其他知识加以融会贯通。我从与大卫·费尔德曼(David Feldman)、朱利安·霍比特(Julian Hoppit)、乔安娜·英尼斯(Joanna Innes)、保罗·詹森(Paul Janssens)、弗兰克·特伦特曼(Frank Trentmann)等人的谈话中获益匪浅,与其他众多长期听我会议报告的学者们进行的讨论亦是如此。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对本书进行了通读,并提出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我对我在萨福克(Suffolk)的邻居——来自 middlegate-prints.com 网站的戴夫·科尔(Dave Cole)深表感激,他热心帮助我搜集《潘趣》漫画,并允许我从他的藏品中复制这些漫画。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它们允许我复制《食税者国家》(*Tax Easter State*)(Ⅲ. 1)和《对土地而不是食品征税》(*Tax Land not Food*)(Ⅲ.6)上的漫画。本书得以最终完成还得益于参考文献编排者克里斯·比彻姆(Chris Beauchamp)、一贯眼光敏锐的编辑琳达·兰德尔(Linda Randall)和索引编制者奥瑞尔·格里菲思—琼斯(Auriol Griffith-Jones)的辛勤工作。

缩略语列表

AMC	Association of Municipal Corporations(市政公司协会)
BL	British Library(大英图书馆)
BLPS	British Libra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英国政治与 济科学图书馆)
Bod.Lib	Bodleian Library, Oxford(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DNB	<i>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i> 《英国人物传记辞典》
FRA	Financial Reform Association(财政改革协会)
FRU	Financial Reform Union(财政改革联盟)
ILP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独立工党)
LCC	London County Council(伦敦郡议会)
LGB	Local Government Board(地方政府委员会)
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劳工代表委员会)
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伦敦经济学院)
MBW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都市工程委员会)
NDC	National Debt Commission(国家债务委员会)
NLW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PP	Parliamentary Papers(国会文件)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国家档案局)
SDF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社会民主联盟)

插图列表

卷首插图：“指引真相”，1909年9月22日的《潘趣》(*Punch*)。

1. 1829年《国家现状》封面的一幅漫画。

2. “一个政治平行线”，1842年10月的《潘趣》：在队伍的后面，罗伯特·皮尔。和威灵顿公爵指挥痛苦的纳税人完成填满国库这个根本无望实现的任务。

3. “间接税”，1842年5月的《潘趣》：纳税人受到间接税幽灵的恐吓。

4. “哈姆雷特和头盖骨”，1894年5月12日的《潘趣》：威廉·哈考特修订遗产税。

5. “沮丧的公爵们”，1894年6月30日的《潘趣》：凝视着他们的财产损失。

6. “对土地而不是食品征税”，从《晨星报》(*Morning Star*)中翻印的海报：自由党政府希望对土地而不是食品征税；上议院试图阻止1909年的“人民”预算。

7. “被强迫的友谊”，1909年10月27日的《潘趣》：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成了令人不安的关系。